

汉代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海路交流的考古学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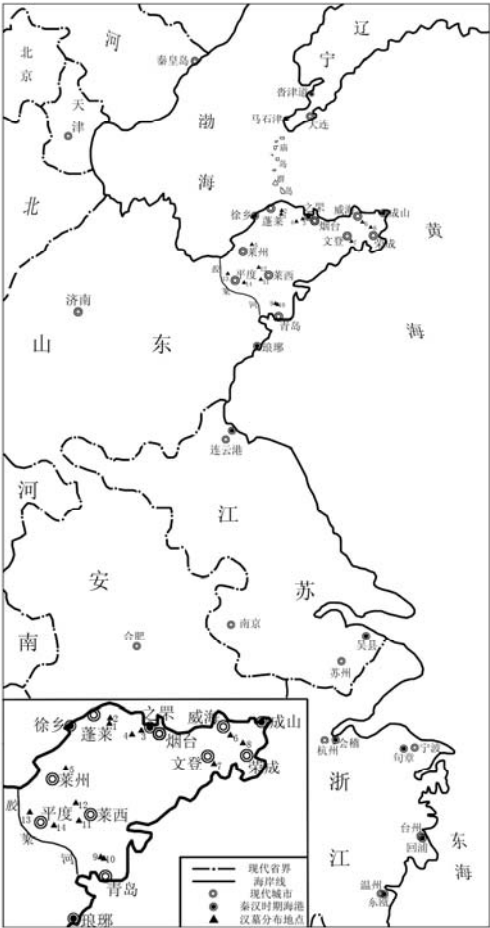
宋蓉 滕铭予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长春, 130012)

内容摘要: 胶东半岛位于山东省东北部, 三面环海, 海岸曲折, 自古就是我国海路交通的枢纽。本文以胶东地区发现的汉代墓葬为研究对象, 运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 通过与周边地区的比较研究, 分析胶东地区汉代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 探讨胶东半岛与其近邻辽东半岛、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代海路交通问题。

关键词: 胶东半岛; 辽东半岛; 长江中下游; 汉墓; 文化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 K871 **文献标识码:** A



图一、部胶东地区汉墓分布及秦汉时期东部沿海港口分布示意图
1. 蓬莱小迟家汉墓 2. 蓬莱大迟家村汉墓 3. 烟台市区汉墓 4. 福山东留公汉墓 5. 莱州朱汉墓
6. 威海市大天东村汉墓 7. 文登石羊村汉墓 8. 荣成梁南庄汉墓 9. 青岛古庙汉墓10. 崂山天封台汉墓
11. 莱西董家庄汉墓 12. 莱西岱野汉墓 13. 平度界山汉墓 14. 平度岔道口

胶东半岛是指山东省胶莱河以东的半岛地区, 主要包括烟台、威海、青岛及其所辖县市。这里三面环海, 海岸曲折, 多深水港湾, 自古就是我国海路交通的枢纽。秦汉时期, 此处便有徐乡(金黄县西北)、之罘(今烟台)、成山(今山东半岛成山角)、琅琊(今胶南与日照之间的琅琊山附近)等多处著名的海港(如图一)。正是由于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 半岛居民较早的开通了近海航线, 利用航海方式与周边地区进行经济往来^[1]。胶东地区发现的汉代墓葬, 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该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有益的补充。

本文试以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 通过与周边地区的比较研究, 分析胶东地区汉代墓葬的文化因素构成, 探讨胶东半岛与其近邻辽东半岛、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汉代海路交通问题。

一、文化因素的初步分析

历年来的考古调查显示, 胶东地区发现的汉代墓葬或墓地约有 140 余处, 但经过正式发掘并见诸报道的只有 10 余处^[2]。主要有蓬莱大迟家村汉墓^[3]、烟台市区汉墓^[4]、福山东留公汉墓^[5]、莱州朱汉墓^[6]、威海市大天东村汉墓^[7]、文登石羊村汉墓^[8]、荣成梁南庄汉墓^[9]、青岛古庙^[10]、莱西董家庄汉墓^[11]、岱野汉墓^[12]、平度界山汉墓^[13]、岔道口^[14](参见图一)。

汉墓材料的发表状况虽不尽如人意, 但从已发表的相关材料出发, 参考其他的研究成果, 我们还是可以对胶东地区的汉代墓葬进行初步分析, 并就其文化因素的构成提出若干看法。笼统来看, 该区文化因素构成复杂, 这本身也成为该区汉墓的一个鲜明特点。下文将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两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具体论述。

1、墓葬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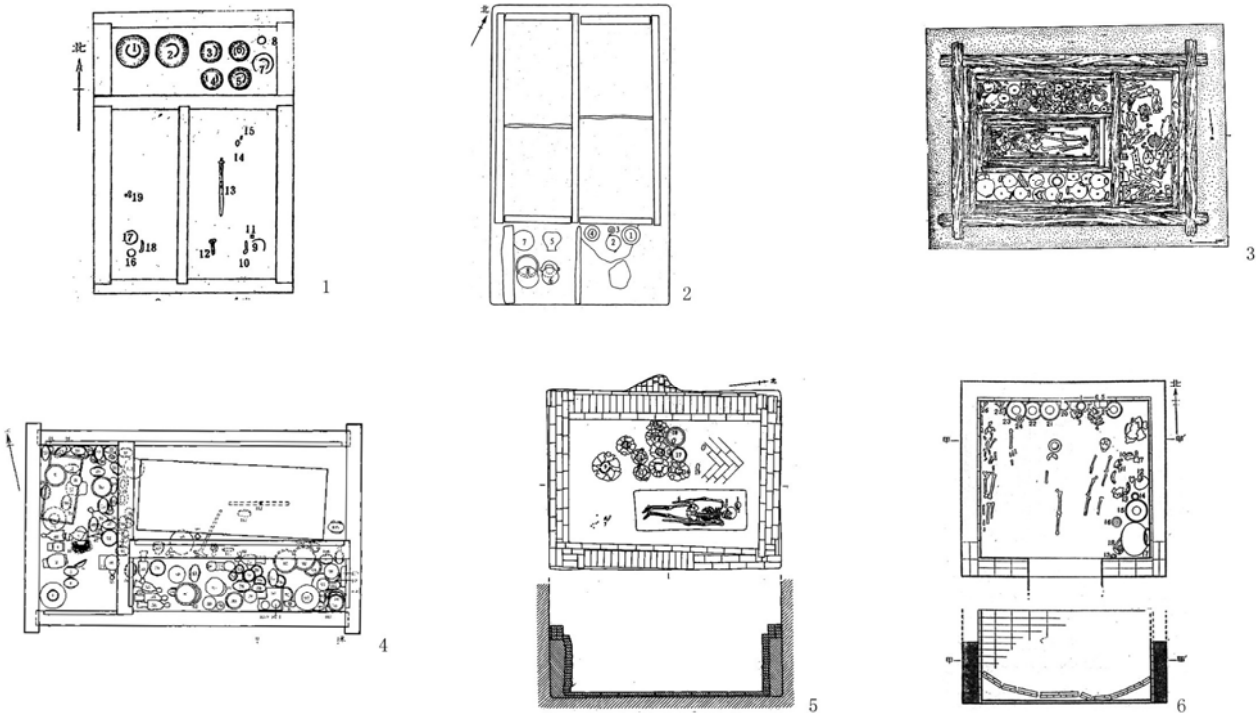
胶东地区汉墓主要有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和竖穴墓两种。砖室墓数量较少，仅发现了三座：烟台市区汉墓和福山东留公村两座画像石墓。根据共出钱币及其他随葬品判断，这三座墓葬的年代可定在东汉晚期^[15]。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这种形制的砖室墓在西汉中晚期就已在河南、长安周边、华北等地区广泛流行；进入东汉以后，它成为各地普遍流行的墓葬形制^[16]。故可视为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竖穴墓数量较多，因墓室材料和构建方式的差别又可分为石椁墓、木椁墓和砖椁墓三类。

石椁墓是竖穴墓圹底部以石板搭砌四壁，顶部以石板作为顶盖的墓葬形制，部分石椁内又以石板分隔出头箱以放置随葬品（图二，1）。这种墓葬形制在西汉时期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常见，如鲁西南的枣庄、苏北的徐州和连云港、河南东部、安徽北部均有发现^[17]（图二，2），而少见于其它地区。故可视为苏鲁豫皖交界区因素。

传统意义上的木椁墓在胶东半岛发现数量较少，仅有莱西董家庄M1、M2^[18]、岱野M2^[19]及蓬莱小迟家M4^[20]。椁室四壁用木板垒成，板的两端凿有子母榫卯，椁底铺木板，顶部以木板覆盖，椁内以木板分隔分出边箱、足箱、棺室（图二，3）。这种椁内分箱的木椁墓具有鲜明的楚文化传统，两汉时期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战国时期楚地（图二，4），可视为长江中下游楚故地因素。

砖椁墓的数量较多，砖砌四壁，底部铺砖，顶部以木板覆盖，与石椁墓的构建方式类似。这种形制的砖椁墓在鲁北地区十分常见，如潍坊后埠下墓地^[21]。但鲁北的砖椁墓内通常仅有简单的一重木棺，而胶东地区的砖椁墓内还有木椁。值得注意的是，胶东地区有的砖椁墓还在木椁与砖椁的缝隙、木椁底部、椁顶盖上填充、覆盖大量的海蛎壳。这种通常所说的“积贝墓”，是汉代流行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地区的一种墓葬^[22]。有学者研究认为，积贝墓最早发生于战国时期的庙岛群岛，由当地的积石墓（积海卵石）演变而成。之后逐渐扩展到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和辽东湾北岸^[23]。可见，长期以来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就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底层^[24]，这一点在环境资源状况、文化传承与交流上都有反映^[25]。如果淡化现行行政区划，从渤海湾东部这一更大的区域视角来考量问题，这种以“积贝墓”为特征的文化因素就该算是胶东地区所自有的了。（如图二，5、6）



图二. 墓葬形制

1、青岛崂山夫妇合葬墓 2、枣庄临山M24 3、莱西岱野M2 4、荆州高台M6 5、威海大天东村M3 6、营城子M40

2、随葬品

胶东地区两汉墓葬的随葬品按质地可分为：陶器、漆木器、铜器、铁器和玉器。陶器是随葬品大宗，依据胎质的不同可以分成泥质陶和硬釉陶两大类。泥质陶的数量较多，质地疏松，多为灰色或红褐色，烧成温度较低。部分器物的表面装饰红、白、黑三色彩绘。个别器物表面装饰银灰色或黑色陶衣。泥质陶器类丰富，以鼎、壶、钆、罐的组合最为常见，此外还有瓮、盆、盘、耳杯、尊、甗、案、方炉、熏炉等。硬釉陶胎质坚硬、呈灰白色，火候较高，外施淡青色釉，器类有壶和甗。漆木器做工精细、器类丰富，主要有盘、案、耳杯、碗、奩、盒、尊、勺、卮、几、梳、篦、俑、偶等。铜器种类丰富，主要有鼎、壶、钆、洗、铙、鍬、熏炉、奩、盆、釜、弩机、戈及铜镜、钱币、带钩、车马器等。铁器多为刀、削、剑一类的兵器，也有少量的铁制容器，壶、釜等。

总体来看，铜器的造型与其他地区并无差别，但数量是其它地区同时期规模相当的墓葬不具备的^[26]，人均占有铜器 5.8 件^[27]，是以淄博为中心的鲁北地区的 1.4 倍，是以临沂为中心的鲁东南地区的 1.54 倍。因此“随葬数量众多的铜器”也可视为本地丧葬习俗的特点之一；漆器在器类、器形、纹饰方面均与临沂地区存在很多共同性，并且与长沙等南方地区出土的漆器有很强的相似性^[28]，从历史上看，无论是临沂地区还是长沙地区都是战国楚国的统治区域，文化上保留了浓厚的楚文化传统，因此也可将其视为楚故地因素。

各类陶器组合、器物形态、器表装饰等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域特色。以下将着重讨论各类陶器所包含的不同文化因素。

鼎、壶、钆、罐这套组合在汉代墓葬中十分常见。但西汉中期以后，中原地区的汉墓中一般已经不出钆^[29]，如西安地区和陕县地区的汉代墓葬，以钆作为随葬品的墓葬年代均在西汉早、中期，西汉晚期墓葬的随葬品中已不见钆^[30]。而胶东地区以钆随葬的几座墓葬年代均在西汉晚期^[31]。苏北的徐州及长江下游地区汉墓中钆的使用一直可以延续到西汉晚期，并且形态与同时期胶东地区汉墓中出土的钆类似^[32]（图三，1、2）。战国晚期伴随着楚国势力向东扩展，江苏北部和长江下游地区被纳入了楚国版图，西汉时期这些地区可能还保留了战国以来形成的楚文化传统，并且逐渐影响到了胶东半岛地区。因此可将胶东地区钆的使用视为楚故地因素的影响。

组合中鼎的形态特别，扁腹平底，腹部有明显的凸棱。这种带腰檐的陶鼎常见于辽东半岛西南沿海地区和山东半岛北部沿海地区（图三，3、4）^[33]，同积贝墓的分布区域大致相当，是渤海湾东部地区特有的文化因素，若从渤海湾东部这一大的地理范围考虑也可将其视为本地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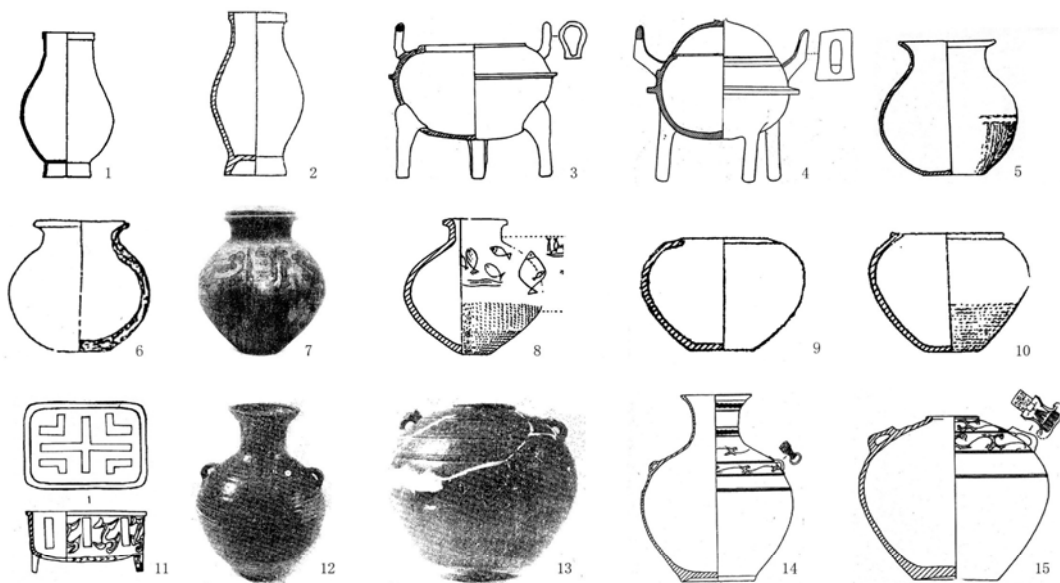
罐的形态较复杂，其中有一类敞口、短颈、鼓腹、平底的罐数量较多（图三，5）。这种形制的罐也是大连地区的汉代墓葬中非常典型的一类器物，延续时间长，演变规律清晰（图三，6）^[34]。胶东地区发现的这几座汉代墓葬年代偏晚，缺少西汉早期的材料，因此很难讨论它的起源与传播。但从西汉中晚期的情况看，两地所出的同类罐形态相似，演变规律相近。综合考虑其分布地域，可以推测这种敞口、短颈、鼓腹、平底罐的形成可能与前文所论及的积贝墓和带腰檐陶鼎情况类似，可能由于渤海湾东部半岛地区相似的资源分布、相似的自然环境形成了某些类似的生活习俗，这两种器物在两地同时存在正是对这种相似性的趋同适应所致。其它形态的罐，如文登石羊村汉墓出土的罐和荣成梁南庄M2：23 分别与鲁北地区的A型和C型罐形态相似（图三，7—10）^[35]。这里与胶东半岛隔胶莱河东西相邻，自然环境相近，尤其是胶莱河两岸的莱西、平度与昌邑均位于胶莱平原，海拔 100 米以下。另外这两地均为战国时期齐国的统治疆域，政治的影响力可能产生了某些共同的文化、习俗。正是由于这种地域上的临近和文化传统的近似使两地居民形成了某些相近的生活方式。若从泰（泰山）沂（沂水）以北这个大的地理区域考虑，这两种形态的罐可视为山东北部地区共有

的文化因素。因此也可将其作为本地因素。

壶是汉代墓葬中最常见的一类随葬器物，西汉晚期，口部逐渐演化成盘口。胶东地区汉代墓葬中随葬的陶壶形态与其它地区类似，并且形态的演变也与其它地区同步，因此可将其视为汉代墓葬共性因素。

泥质陶中的方炉是一类非常有地域特色的器物，在大连营城子、老铁山、荣成梁南庄以及威海蒿泊大天东村都有出土，而其它地区少见^[36]（图三，11）。同上文讨论的积贝墓、带腰檐陶鼎及敞口、短颈、鼓腹、平底罐类似，是渤海湾东部地区的共有因素，也可将其作为胶东半岛的本地文化因素。

以硬釉陶和印纹硬陶随葬是长江下游地区先秦时期以来的传统，西汉时期逐渐形成了鼎、盒、壶、甗的硬釉陶组合^[37]。胶东地区西汉墓葬中随葬的硬釉陶器组合不完整，器类以壶为主，偶见壶、甗组合，但同类器物的形态与同时期长江下游汉墓所出类似。胶东地区硬釉陶的出现显然是受到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影响（图三，12—15）。



图三、器物图

1、威海大天东村M4：21 2、凤凰山M2P2：3 3、威海大天东村M4：19 4、营城子M10：83 5、威海大天东村M4：8 6、（日）营M1（引自《中国东北地区汉墓研究》） 7、文登石羊村（中墓） 8、女郎山西M17：4 9、荣成梁南庄M2：23 10、女郎山西M2：3 11、威海大天东村M3：21 12—13，出自莱西董家庄汉墓 14—15，湖州方家山M24：5、M24：8

综上所述，胶东半岛汉代墓葬文化因素构成复杂，为清晰起见，现将基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两方面的分析而得出的胶东汉墓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列成表一。从表一可以看出，胶东半岛汉代墓葬所含文化因素大致可分为四类：汉代墓葬共性因素、长江中下游文化因素、苏鲁豫皖交界区因素和本地因素，其中长江中下游因素和本地因素又可分为若干细类。汉代墓葬共性因素主要体现在砖室墓的出现以及陶壶的使用方面；长江中下游因素中又可细分为楚故地因素及长江下游地区因素，前者主要体现在木椁墓的使用、以漆器和陶甗随葬等方面，后者则集中体现在硬釉陶的使用上。苏鲁豫皖交界区因素主要指石板墓的使用。此处需对胶东半岛本地因素的情况予以特别说明。如表一所示，胶东半岛本地因素包含了山东北部共性因素、渤海湾东部地区共性因素和胶东半岛因素。之所以将这三种文化因素都看作是胶东半岛本地因素，主要基于如下三点考虑：一、文章虽以胶东半岛的汉墓作为主要讨论对象，但从大的地理区域出发，胶东半岛是渤海湾东部地区的一部分；此外，以泰沂为界，胶东半岛

属于山东北部地区，这里因战国时期皆为齐国疆域而文化传统较为一致。二、胶东半岛所见汉代墓葬时代偏晚，缺少西汉早期的材料，而西汉中晚期这些文化因素在以上讨论的大地理区域内均很常见，其传播和影响的方向实难确定。三、胶东半岛是连接东北亚大陆、中原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的海路交通枢纽，与其它地区交流的空间比较广阔，因此即使是其本地因素也应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基于以上三点，山东北部共性因素、渤海湾东部地区共性因素皆可归为胶东半岛本地因素一类。

表一 胶东半岛文化因素构成比较表

类别 事项		汉代墓葬 共性因素	长江中下游因素		苏鲁 豫皖 交界 区因素	本地因素		
			楚故地因素	长江下游因素		山东北部 共性因素	渤海湾东部 共性因素	胶东半岛 因素
墓葬形制	因素构成	√	√		√		√	
	具体内涵	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	木椁墓		石椁墓		积贝墓	
随葬品	因素构成	√	√	√		√	√	√
	具体内涵	陶壶	陶钺、漆器	硬釉陶		两种形制的陶罐	带腰檐陶鼎、陶方炉、陶罐	以数量丰富的铜器随葬

二、各类文化因素形成原因的探索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胶东地区汉代墓葬所包含的各类文化因素分别体现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等不同方面，其分布范围和形成原因也各有不同。汉代墓葬共性因素的出现得利于汉王朝的统一；山东北部共性因素文化因素的形成可能是由于地域相邻，文化传统相似，从而形成了相似的生活习俗；胶东半岛因素的形成可能得力于其作为海路交通枢纽的特殊地理位置；除此之外，长江中下游因素、苏鲁豫皖交界区因素及本地因素中包含的渤海湾东部共性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分布存在共同点，即均沿东部沿海地区分布，在胶东半岛西部的鲁北地区不见。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与胶东半岛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下将结合文献讨论这些文化因素形成的原因。

山东半岛沿岸居民先秦时期就已开通近海航线，齐初建国，即重视“便鱼盐之利”（《史记·齐太公世家》），利用沿海交通较为优越的条件发展经济，成为富足的“海王之国”（《管子·海王》）。齐人习于海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有记“太公乃迁康公于海上，食一城。”刘邦破楚，田横“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刘邦以其“在海中不收”而深感不安（《史记·田儋列传》）^[38]。以上事例都说明胶东半岛海路交通的发达。秦汉时期这里已有多个初具规模的港口，由此北行渡过渤海湾可以到达辽东半岛，南行可达黄海、东海甚至南海沿岸地区，这里是连接辽东半岛和东南沿海的交通枢纽。汉代人已经掌握了关于航道、季

风、洋流、天象等航海知识，海船制造技术也已达相当水准^[39]。各地通过海路交流也已无技术上的障碍。

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并且一直延续下来^[40]。据王绵厚先生研究，汉魏时期由山东的“东莱郡”（大致包括了胶东半岛地区）海行，经由庙岛群岛可以到达辽东“马石津”（辽东半岛旅顺口老铁山）和“沓津道”（辽东半岛普兰店沙湾河口）^[41]。文献中有多条关于这条海上通道的记载。如东汉末年，有许多所谓“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三国志·魏书·管宁传》）的情形。东莱黄人太史慈、北海朱虚人邴原、管宁、乐安盖人国渊、平原人王烈等等，都曾避战乱入海至于辽东^[42]。

处长江下游的江浙沿海地区秦汉时期也有多处重要海港，如吴县（今江苏苏州）、会稽（今浙江杭州东南）、回浦（今浙江台州）等。“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吴越人，以“居东海之滨”的地域优势，较早的掌握了航海技术。文献中对于胶东半岛与江浙地区海上往来的记述主要体现在军事方面。《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述了吴王夫差曾“从海上攻齐，齐王败吴”的历史事件。《越绝书·外传记地》中记述了吴国率众迁都琅琊的过程，其武装部队的主力就有“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充分显示了吴国近海航运方面的能力。

航海知识的丰富、航运能力的完善使胶东半岛、辽东半岛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海上交流成为可能。通过前文对胶东半岛汉代墓葬文化因素构成的分析可以看出，胶东半岛同辽东半岛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存在许多相似性。一种文化因素在特定地区的出现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方面，是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动将其原有文化带入了迁徙地，而当地又有相似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从而接受了这种文化并在当地扩展开来；另一方面可能是政治、军事的力量使当地接受了统治者的文化传统，从而形成了与其相似的文化面貌；还有一种可能是由商品的交流、产品的输入而使两地产生了相同的文化因素。

积贝墓在胶东和辽东半岛的出现恰说明了第一方面。海洋为两地居民提供了丰富的贝类资源。同中原地区流行的积石积炭墓一样，积贝墓也有防潮和防盗的功能，积贝是适应当地客观条件、合理利用当地资源的表现。所以当积贝墓在庙岛群岛产生后不久就伴随着渤海沿岸居民的迁徙，在渤海两岸发展起来。汉代的积贝墓仅发现于辽东半岛西南沿海地区和胶东半岛北部地区及庙岛群岛，而在东海、黄河、南海地区不见。并且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积贝墓中还常伴出相同的特色器物，如腰檐鼎、陶方炉等。因此有学者认为，使用积贝墓的居民在人类集团或文化传统上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正是以渤海为通道的人群移动，加上沿海地区相近的自然环境，使积贝墓在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得以流行^[43]。

战国晚期，楚国势力不断向东扩展，东北境已达山东南部^[44]。但是山东中北部有实力同样不容小觑的齐国，向北发展必定会面对强大的阻力。胶东地区地处沿海远离齐国统治中心，楚文化通过东部沿海地区向胶东地区渗透更容易实现。胶东地区汉代墓葬中流行木椁墓和漆器，这些均不见于鲁北地区，而在鲁东南的临沂、日照等地汉墓中十分常见。因此，可以推测战国时期楚文化可能是通过山东南部的临沂地区沿东部沿海进入胶东地区，并延续至汉代。

硬釉陶器是江浙地区的特色器物。这一地区与胶东半岛存在着便利的海路交通优势，经济发达。两地在汉代可能就已存在着海路的商品贸易往来。这种硬釉陶不见于鲁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而在鲁东南的安丘^[45]、日照^[46]、五莲^[47]等地多有发现。因此，可以推测胶东半岛汉代墓葬中出现的硬釉陶器可能是其与江浙地区海上商品贸易的结果。另外随葬丰富的铜器是胶东半岛葬俗的一大特色，数量如此众多的青铜器，尤其是青铜容器在同时期其它地区同等规格的墓葬中非常少见。墓主人所拥有的墓葬规模和随葬品数量反应了其生前的社会地位及经济实力。胶东半岛的这一丧葬习俗可能正是当地经济发达的体现，而这可能正得益于这里发达的海上贸易。

以淄博为中心的鲁北地区西周以来就是齐文化的中心分布区,汉代仍保持着本地文化传统^[48]。因此外来文化因素很难对其产生影响。铅釉陶^[49]是西汉中期之后非常流行的一类随葬器物,在西北、华北、以及秦淮以南的汉墓中均能见到以这类器物随葬的现象。但铅釉陶在西汉时期的鲁北地区非常少见,到东汉中期之后才逐渐增多。胶东地区的汉代墓葬中也未发现这类器物。鲁北地区随葬品组合简单,陶礼器非常少见。而胶东地区随葬品种类丰富,陶礼器组合完整,与鲁北地区存在较大差异。鲁北地区常见的特色器物,如喇叭口、束颈、扁腹壶,也很难在胶东地区汉墓中见到。因此,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胶东地区通过鲁北与中原地区的陆路交通似乎不及海路交通发达。

三、结语

胶东半岛三面环海的地理优势为其与周边沿海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使其有可能接触到其它地区的丰富文化。通过海路往来,加强了这里与辽东半岛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联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通过前文的分析可将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海路交流概括为以下几点:1)与辽东半岛的交流主要体现在积贝墓和一些特色器物的流行方面,这些可能主要是由沿海居民的迁徙造成的;2)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流包括了两方面,一方面是战国晚期楚国势力向山东地区的扩张,将楚文化由南部的临沂、日照等地沿东部沿海渗透到了胶东半岛;另一方面是汉代胶东半岛与江浙沿海地区的商品交流。鲁北地区的保守性阻隔了西部中原地区与胶东半岛的交流,故胶东半岛的文化面貌较多的呈现出与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的相似性。

参考文献

- [1] 据王子今. 秦汉交通史稿[R].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182—191.
- [2] 党浩. 胶东地区汉墓的特征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A]. 汉代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314—320.
- [3] 罗世恒等. 山东蓬莱市大迟家两座西汉墓[J]. 考古, 2006(3): 85—87.
- [4] 林仙庭. 烟台市区发现殉鹿汉墓[J]. 考古, 1985(8): 762—763.
- [5] a. 李克敏. 山东福山东留公村汉墓清理简报[J]. 考古通讯, 1956(5): 16—19.
b. 福山县文化馆图博组. 山东福山县东留公村汉墓画像石[J]. 文物资料丛刊·4,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244—246.
- [6] 党浩. 山东莱州抢救发掘一批汉代墓葬[N]. 中国文物报, 2003—04—18(1).
- [7] 威海市博物馆. 山东威海市蒿泊大天东村西汉墓[J]. 考古, 1998(2): 25—30.
- [8]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 山东文登县的汉木椁墓和漆器[J]. 考古学报, 1957(1): 127—131.
- [9] 烟台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东荣成梁南庄汉墓发掘简报[J]. 考古, 1994(12): 1069—1077.
- [10] a. 孙善德等. 青岛崂山县发现一座西汉夫妇合葬墓[J]. 文物资料丛刊·9,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181—184.
b. 时桂山. 山东崂山古庙汉墓[J]. 文物资料丛刊·4,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1: 242—243.
- [11] 莱西县文化馆. 莱西县董家庄西汉墓[J]. 文物资料丛刊·9,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5: 185—196.
- [12] 烟台地区文物管理组. 山东莱西县岱野西汉木椁墓[J]. 文物, 1980(12): 7—16.
- [13] 青岛市文物局. 山东青岛市平度界山汉墓的发掘[J]. 考古, 2005(6): 32—42.
- [14] 李秀兰. 山东平度市出土一批青铜器[J]. 文物, 1993(4): 95—96.
- [15] 同注[4]、[5].
- [16] 参见: 黄晓芬. 汉墓的考古学研究[R]. 长沙: 岳麓书社, 2003: 第四章、第五章.
- [17] 燕生东等. 苏鲁豫皖交界区西汉石椁墓及其画像石的分期[J]. 中原文物, 1995(1): 79—103.
- [18] 同注[11].
- [19] 同注[12].
- [20] 同注[3].
- [2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潍坊后埠下墓地发掘报告[A]. 山东省高速公路考古报告集(1997)[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0年: 234—286.
- [22] 白云翔. 汉代积贝墓研究[A]. 刘敦愿先生纪念文集[C].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1998: 404—421.
- [23] 同上注.
- [24] “文化底层”的内涵主要有二: 一、具有相近的气候、环境、资源的一块区域; 二、具有相近的物质文

化、宗教、社会演进机理等的文明形态。因两者紧密相关、互有影响，或可与“区域共同传统”这一概念有相通之处，如“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的底层”。这一概念的应用以张光直先生最有代表性。参见：张光直. 中国古代文明的环太平洋底层[A]. 中国考古学论文集[C]. 北京：三联书店，1999：357—369.

^[25] 这一区域皆主要为低山丘陵区，海洋性气候，温暖湿润，无霜期长，雨量丰富，这种自然地理环境为当地居民发展采集、捕捞、农业等多种经济生产方式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两大半岛的文化交流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开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时代达到兴盛阶段。依据：佟伟华. 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的交流[A]. 考古学文化论集（二）[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78—95.

^[26] 注[[2]：317、319页.

^[27] 所谓人均占有铜器数量是指该地区出土铜器的总数与墓葬埋葬人数的比值。这里统计的铜器包括容器及铜镜、带钩、车马器等小件器物，不包括漆器饰件。

^[28] 同注[2].

^[29] 孙机. 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R].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318.

^[30] a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等. 长安汉墓[R].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陕县东周秦汉墓[R].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31] 同注[7]、[9]、[12].

^[32] 分别参见：宋蓉. 徐州地区西汉墓葬的分期和文化因素分析[J]. 华夏考古，待刊；张玲. 长江下游地区西汉至新莽中小型墓葬研究[D]. 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04.

^[33] 注[22]：417.

^[34] 郑君雷. 中国东北地区汉墓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7：113.

^[35] 宋蓉. 山东中北部地区两汉中小型墓葬初论（未刊）.

^[36] 注[22]：417.

^[37] 杨哲峰. 汉墓结构和随葬釉陶器的类型及其变迁[D].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5：231—278.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者在文中称该区为“江东地区”，即“长江下游地区”，为保持文章称谓的一致，本文一律写作“长江下游地区”。

^[38] 以上山东半岛海事发展状况依据：王子今. 秦汉交通史稿[R].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第六章，190—191.

^[39] 同上注，208—234.

^[40] 佟伟华. 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的交流[A]. 考古学文化论集（二）[C].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78—95.

^[41] 王绵厚等. 东北古代交通[R]. 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72.

^[42] 分别见于：三国志·吴书·太史慈传[M]、三国志·魏书·邴原传[M]、三国志·魏书·管宁传[M]、三国志·魏书·国渊传[M]、后汉书·独行列传·王列[M].

^[43] 注[22]：417.

^[44] 《淮南子·兵略训》追忆说：“昔楚人之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东裹郢郢，颖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域。”

^[45] 贾德民等. 山东安丘县出土一批西汉器物[J]. 考古，1995（2）：186—187.

^[46] 何德亮等. 日照海曲汉代墓葬考古的主要收获[J]. 文物世界，2003（5）：41—46.

^[47] 潍坊市博物馆等. 山东五莲张家仲岗汉墓[J]. 文物，1987（9）：76—83.

^[48] 同注[35].

^[49] 这种釉陶器一般为绿色或黄褐色，由于釉药内含有大量的氧化铅而得名，烧制时使用的火候不高。据：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 战国秦汉考古（中国考古学之四）[R]. 1981：107.

The archeological evidence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Jiaodong peninsula, Liaodong peninsula and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 valley by sea

Song Rong Teng Ming-yu

Abstract: The Jiaodong peninsula lies in the northeast of Shandong; there are long and zigzag sea line and several open ports. it has been a very important area in sea transportation from ancient period. The object of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is graves of Jiaodong in the Han dynasty. I investigated the composition and their relationship of cultural elements, and compared with the cultural elements of vicinages. The paper wants to discuss the communication of Jiaodong peninsula, Liaodong peninsula and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 valley by sea.

Key words: Jiaodong peninsula ;Liaodong peninsula ;middle and lower Yangtze Rive valley ;grave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analyses of cultural elements

收稿日期: 2008-03-20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宋蓉,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